

DOI: 10.13718/j.cnki.xdzk.2021.12.019

疫情后大学生感恩和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夏 赟, 何 雯, 钱闰建

重庆文理学院 学生工作处, 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 采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感恩问卷和领悟社会支持问卷对 1186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 探索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心理创伤后成长程度, 考察其感恩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并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 (1) 疫情后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对生活欣赏的改变水平高于其他 5 个维度的改变水平, 湖北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其他区域的大学生, 男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女生, 学生干部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非学生干部; (2) 感恩和社会支持可显著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 (3) 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的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 也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大学生; 创伤后成长; 感恩; 社会支持;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B845.67

文献标志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3-9868(2021)12-0160-06



Effects of Gratitude and Social Suppor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After COVID-19 Epidemic

XIA Yun, HE Wen, QIAN Lyujian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ratitude, social support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1186 college students at 1 year after COVID-19 epidem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PTG of college student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the level of appreciating life changes is higher than all dimensions, students in Hubei have more changed than others, male students have more changed than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cadres was higher than others students. 2) Both gratitude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3) Social suppor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ratitud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after 1 year after COVID-19 epidemic, gratitude not only had a direct effect on post-Htraumatic growth, but also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ocial support.

收稿日期: 2021-05-24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 2019 年规划项目(19SKGH161);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项目(2020-GX-132).

作者简介: 夏 赟, 硕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 何 雯, 硕士, 讲师.

Key words: COVID-19 epidemic; college students; post-traumatic growth; gratitude, social support, mediation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成为重大心理创伤事件, 因其生死攸关、突如其来、未知性等特点, 不仅严重危及公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也对全国民众尤其是湖北民众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1]. 根据积极创伤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 创伤事件在给人们带来创伤应激障碍、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反应的同时^[2], 也会给个体心理带来积极的变化, 这种积极影响被 Tedeschi 和 Calhoun 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简称 PTG)^[3]. 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经历过隔离的个体可由此学习如何克服逆境、增强自我力量、实现自我超越^[4]. 因此, 如何帮助大学生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成长, 帮助其发掘正性心理体验, 提高其抵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承受力和保持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主要考察发生疫情一年后大学生心理成长程度以及感恩、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心理成长的关系, 为疫情期开展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PTG 是指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5], 主要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等 3 个方面的内容^[6]. 研究发现, 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人群都有可能出现 PTG^[7], 如新冠肺炎抗疫一线护士 PTG 处于中等水平^[8], 原志芳等人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 PTG 总分为 (59.27 ± 21.22) , 接近中等水平成长^[9]. 另有学者发现地震幸存者 PTG 发生率高达 51.1%^[10], 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 PTG 发生率高达 62.76%^[11].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灾难受害者人群, 较少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 PTG 的影响. 少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如何在重大疫情治理中引领大学生成长发展, 认为可利用重大疫情治理的伟大实践对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榜样教育、实践教育和责任教育, 能有效促进大学生成长^[12]. 大多数学生认同自己在疫情中历练了成长, 通过对生命、生活和人生的新思考, 提升了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和体验能力, 应对逆境和危险的力量有效增强, 内心更加充实丰盈^[13], 但尚无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是否存在 PTG, 其 PTG 特点等相关实证研究. 因此, 本研究假设 1: 在此次疫情中, 大学生获得创伤后成长.

目前对 PTG 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和环境因素上, 已有研究发现, 自我同情^[14]、感恩、社会支持^[15]、主动反刍、性别^[16]、年龄^[17]、教育水平、人格特点、创伤事件本身严重程度^[18]等是 PTG 的影响因素. 近期研究还发现, 社会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掌握程度^[9]能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PTG; 社会支持、职称、文化程度、原工作科室、防疫一线工作时间、是否接受过系统灾害护理培训、有无类似救援经历、有无亲友同事确诊感染、护患关系满意度、有无参与危重患者抢救经历能促进新冠肺炎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 PTG^[8]. 梳理已有研究, 发现这些结论主要聚焦在病患者、地震经历者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中医护工作者等群体, 鲜有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促使大学生产生 PTG 的影响因素.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 感恩可以拓展个体的行为和认知, 改善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模式, 有利于个体建立支持性的社会系统, 并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19], 已有研究发现, 感恩不仅对 PTG 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且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预测 PTG^[20].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涌现出众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 有 84.6% 的大学生表达“在疫情防控中有很多令我感动和感恩的事”. 党中央科学防治疫情举措、医务工作者奋力抗战一线、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抗疫阻击战、全国开通各大心理支持热线、政府学校制定分批返校方案、高校积极探索在线教学机制^[21]、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高度关注等为大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尤其是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获得了全国高度支持. 因此本研究假设 2: 不同程度的疫情区大学生 PTG 程度不同, 感恩能正向预测 PTG, 社会支持在感恩与 PTG 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 2021 年 1 月, 以便利抽样方式选取重庆市和湖北省 5 所大学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发放网络问卷

链接,共收到问卷 1 524 份,有效问卷 1 186 份,有效率 77.8%,其中男生 581 人(49%),女生 605 人(51%),平均年龄为 (20.89 ± 1.27)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本研究使用汪际等修订的 PTG 量表^[22],该量表有 21 个项目,分为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增强、精神的改变和对生活的欣赏 5 个维度。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从 0(没有变化)到 5(变化很大)。量表总分范围为 0~105 分,其中:小于 60 分为低水平成长,60~79 分为中等水平成长,大于等于 80 分为高水平成长^[23]。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信效度良好。

1.2.2 感恩问卷(Gmtitude Questionnair-6, GQ-6)

该量表由 Mccullough 等编制^[24]。本研究使用魏昶等人修订的汉化版量表^[25],此量表共包含 6 个项目,项目 3 和项目 6 为反向计分题,采用 7 级评分,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感恩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信效度良好。

1.2.3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本研究参照姜乾金修订的领域社会支持量表^[26]编制而成,考虑到研究对象为大学生,将“领导、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保留“亲戚”。该量表共包括 12 个项目,采用 7 级评分,从 1(肯定不是)到 7(肯定是)。总分 12~36 分为低支持状态,总分 37~60 为中间支持状态,总分 61~84 为高支持状态,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信效度良好。

1.3 研究程序

采用问卷星设计问卷,通过微信、QQ 平台将问卷链接发放至所选班级,在指导语中说明调查目的、内容、选择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并设置答题有 50%机会抽取红包的答题规则,以提高问卷答题率,且为了保证问卷的完整性、有效性,将所有项目设为必答题,同一账号、同一设备、同一 IP 地址仅能填写 1 次,2 天内收集完数据。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全部经由问卷收集,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将研究的所有项目纳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9.40%,小于 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5 数据分析

将问卷星数据导入采用 SPSS 21.0 软件检验缺失值和异常值,并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

2 结 果

2.1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 PTG 现状

本研究中 1 186 名大学生各自的 PTG 总分为 (64.67 ± 21.39) ,表明疫情中大学生 PTG 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与他人关系 (21.50 ± 7.65) 分,新的可能性 (14.81 ± 5.46) 分,个人力量增强 (11.96 ± 4.41) 分,精神的改变 (6.40 ± 2.41) 分,对生活的欣赏 (10 ± 3.43) 分。将各维度的平均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其差异显著 $[F(4, 4740)=97.73, p<0.001]$,对生活的欣赏显著高于精神的改变、精神的改变显著高于与他人关系、与他人关系显著高于个人力量增强、个人力量增强显著高于新的可能性。

根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程度大小,将被调查学生分为湖北组和非湖北组,然后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湖北组大学生在 PTG 总分及其 5 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湖北组,男性大学生在 PTG 总分及其 5 个维度的得分也均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的大学生在 PTG 总分和新的可能性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大学生,结果见表 1。

表 1 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组别大学生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bar{x} \pm s$)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PTG 总分	与他人关系	新的可能性	个人力量增强	精神的改变	对生活的欣赏
区域	湖北	397	68.96±21.00	22.57±7.60	16.01±5.38	12.83±4.41	6.84±2.37	10.71±3.36
	非湖北	789	62.51±21.22	20.96±7.62	14.21±5.40	11.52±4.36	6.17±2.40	9.64±3.41
		<i>t</i> 值	4.95***	3.44***	5.42***	4.85***	4.58***	5.10***
性别	男	581	66.83±22.87	22.00±8.07	15.59±5.75	12.39±4.73	6.61±2.53	10.23±3.63
	女	605	62.59±19.66	21.03±7.20	14.06±5.05	11.54±4.05	6.19±2.28	9.78±3.21
		<i>t</i> 值	3.42***	2.17*	4.87***	3.33***	3.07**	2.28*
班干部	学生干部	295	66.76±19.57	22.20±6.87	15.37±5.17	12.30±4.17	6.59±2.29	10.30±3.18
	非学生干部	891	63.98±21.92	21.27±7.88	14.63±5.54	11.85±4.49	6.33±2.45	9.90±3.51
		<i>t</i> 值	2.05*	1.93	2.02*	1.53	1.63	1.84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以下同.

2.2 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与 PTG 之间的相关

对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与 PTG 3 个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表 2), 结果发现 3 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在 0.36~0.52 之间.

表 2 大学生感恩、社会支持与 PTG 之间的相关

	$\bar{x} \pm s$	感恩	社会支持	PTG
感恩	34.99±5.64	1.00		
社会支持	62.64±13.09	0.52**	1.00	
PTG	64.67±21.39	0.36**	0.48**	1.00

2.3 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对 PTG 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采用温忠麟等人^[27]提出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 估计间接效应值及相应的标准误差和 t 值, 通过三步分析分别求得总效应 c 、间接效应 ab 和直接效应 c' , 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见表 3.

表 3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 PTG 的中介效应检验($n=1\ 186$)

		第一步(系数 c)	第二步(系数 ab)		第三步(系数 c')
		PTG(c)	社会支持(a)	PTG(b)	PTG(c')
自变量	感恩	0.36***	0.52***		0.14***
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			0.48***	
	R^2	0.13	0.27	0.23	0.25
	F	170.37***	434.28***	362.33***	196.20***

由表 3 可见, 以上每一步回归系数都显著($p<0.001$), 由此可知,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 PTG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百分比为 $0.52 \times 0.48 / 0.36 = 69.3\%$.

3 讨 论

3.1 疫情中大学生 PTG 的现状

本研究是在疫情发生 1 年后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 结果发现大学生在此次疫情中获得了中等水平成长, 验证了假设 1.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疫情常态化和时间的推移, 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对疫情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反思, 从而促进了 PTG 水平提高. 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在直面死亡威胁之后, 变得更加珍惜生命, 珍惜每一天的价值, 从而改变了自己对生命事务的优先顺序^[28]. 在 PTG 各维度上, 得分最高的是对生活的欣赏,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15], 这可能是已有研究的创伤性事件是地震等灾害, 本研究创伤性事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创伤性事件性质和程度有区别, 此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全球, 不仅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也打破了全球人们的生活方式, 昔日普通平淡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大学生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 对普通的生活多了一些欣赏与珍惜.

本研究发现湖北省大学生 PTG 水平显著高于非湖北大学生, 表明受创伤事件严重程度是 PTG 的影响

因素,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可能是因为,湖北是全国疫情最严重区域,经举全国之力获得了抗疫胜利,因此湖北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更为全面、深入、积极,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还更能直接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在疫情持续 1 年后,他们的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其紧张情绪得到缓解,心理也在经历长时间沉思后,能够领悟到更多的 PTG.本研究还发现男性的 PTG 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已有研究女性 PTG 得分显著高于男性的研究结论相反^[29-31],尚不清楚产生的原因,可在日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学生干部的 PTG 水平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具体差异体现在新的可能性这个维度.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一般高于非学生干部^[32],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多采用乐观、求助和解决问题等积极认知和行为方式来应对,更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适应调整,因此更有可能抓住新的机会、适应新的环境.

3.2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感恩对 PTG 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感恩水平越高,其 PTG 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验证了假设 2.如伍新春等人对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学生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发现,感恩正向预测 PTG^[15].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解释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 PTG 的形成机制,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中介效应显著,说明感恩通过社会支持对大学生 PTG 产生正面影响.根据感恩的道德情绪假说^[33],感恩的道德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有助于个体建立互惠的人际关系,增加施恩者对受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提升社会支持力度^[34].

拓展认知加工模型认为^[35],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提升安全感和归属感,增加自我效能感,从而实现 PTG.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疫情中感恩水平高的大学生更珍惜失而复得的平静生活,对党和政府、医务工作者、抗疫普通民众、以及在疫情期间给予个体支持的所有群体和个人充满感恩,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之情、亲社会行为,如奋发学习、增长才干、报效祖国、善待社会、与他人友善相处等,这些都有助于其建立支持性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亲密与陪伴,促进其融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肯定与支持和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提升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积极思考未来发展,增加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总之,本研究探究了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 PTG 程度,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在感恩对 PTG 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获得中等水平的创伤后成长,感恩不仅可以直接对 PTG 发生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 PTG 产生正向的影响,对疫情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安媛媛,孙一静,伍新春.心理创伤预防与干预的公共卫生模型及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7(4):5-21,189.
- [2] KOLLTVEIT S, LANGE-NIELSEN I I, THABET A A M, et al. Risk Factors for PTS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Gaza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2, 25(2): 164-170.
- [3]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6, 9(3): 455-471.
- [4] 张迪,田雨馨,伍新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隔离:心理反应与影响因素[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7(4):31-41.
- [5]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 [6]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 Journal of Traumatic, 1996, 9(3): 455-471.
- [7] HOLTMAAT K, SPEK N, CUIJPERS P, et al.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Head and Neck Cancer Survivors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 Psycho-Oncology, 2017, 26(1): 96-101.
- [8] 崔金锐,胡露红,黄丽红,等.新冠肺炎抗疫一线护士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护理管理,2021,21(1):54-59.
- [9] 原志芳,沈悦好,刘素彦,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20,55(S1):587-589.
- [10] JIN Y C, XU J P, LIU D 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ost Traumatic Growth: Gen-

der Differences in PTG and PTSD Subgroups [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4, 49(12): 1903-1910.

[11] JIA X J, YING L H, ZHOU X, et al. The Effects of Extraversion, Social Support on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J]. Plos One, 2015, 10(3): 121-140.

[12] 龙汉武. 在重大疫情治理中引领大学生成长发展的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11): 156-159.

[13] 西南大学新学工创新中心课题组, 孙楚航. 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年大学生影响研究——基于全国 45 所高校 19 850 名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4): 43-48.

[14] 刘艾祎, 王文超, 伍新春, 等. 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调节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2): 223-228.

[15] 周 宵, 安媛媛, 伍新春, 等. 汶川地震三年半后中学生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1): 68-74.

[16]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6, 9(3): 455-471.

[17] CORDOVA M J, GIESE-DAVIS J, GOLANT M, et al. Breast Cancer as Trauma: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Medical Settings, 2007, 14(4): 308-319.

[18] MORRIS B A, SHAKESPEARE FINCH J, RIECK M, et al.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n Aus-Trialian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05, 18(5): 575-585.

[19]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8-226.

[20] 伍新春, 周 宵, 刘淋淋, 等. 青少年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社会支持与主动反刍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科学, 2014, 37(5): 1148-1153.

[21] 姜玉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高校公共体育在线教学机制研究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5(6): 141-146.

[22] 汪 际.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及其意外创伤者常模的研制 [D].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 2011.

[23] FEDER A, SOUTHWICK S M, GOETZ R R, et al.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Former Vietnam Prisoners of War [J].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008, 71(4): 359-370.

[24] 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TSANG J A.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1): 112-127.

[25] 魏 昶, 吴慧婷, 孔祥娜, 等. 感恩问卷 GQ-6 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10): 1201-1202.

[26] 汪向东, 王希林, 马 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31-133.

[27] 温忠麟, 侯杰泰, 张 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J]. 心理学报, 2005, 37(2): 268-274.

[28] 陈杰灵, 伍新春, 安媛媛. 创伤后成长的促进: 基本原理与主要方法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14-122.

[29] 伍新春, 王文超, 周 宵, 等. 汶川地震 8.5 年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8, 34(1): 80-89.

[30] 杨 凡, 林沐雨, 钱铭怡. 地震后青少年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关系的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5): 614-617.

[31] 张晓茹. 芦山灾区中学生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在感恩和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9): 1355-1358.

[32] 刘 洪, 周明君, 颜 南, 等.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关系 [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9): 1202-1204.

[33] MCCULLOUGH M E, KILPATRICK S D, EMMONS R A, et al. Is Gratitude a Moral Affect?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27(2): 249-266.

[34] BARTLETT M Y, DESTENO D.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7(4): 319-325.

[35] LEPORE S J, KERNAN W D. Positive Life Change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Illness: An Expanded Social-Cognitive Processing Model [M] // Medical Illness and Positive Life Change: Can Crisis Lead to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139-152.